

军事革命对近代早期欧洲军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许二斌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军事革命扩大了近代早期欧洲军人与平民的分野, 使军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中世纪骑士军队那种以追求荣誉、个人的英勇和对领主的忠诚为美德的观念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以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集体感、合作精神、标准化、等级制为特征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主要由于军事革命而形成的这些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后来被引入到工厂、机关、学校等社会组织中, 有效地改善了这些组织的管理,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 军事革命; 欧洲; 军人; 行为方式; 价值观念

中图分类号: K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605X(2007) 06- 0005- 06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revolutions to the deportment and idea about value of the soldiers of early modern Europe

XU Er- bin

(Histor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military revolutions broadened the interflaves between soldiers and the civilian, so they made the European soldiers' deportment and idea about value present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the medieval knight's notion which regard pursuit of honor, individual valor and loyalty to one's lord as virtue had disappeared, what had replaced it is the new notion that regard merits as to obey the orders, to observe the disciplines, the loyalty to the collectivity, the team spirit,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grading system. Subsequently, the soldier's deportment and idea about value that came into being mostly as a result of the military revolution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factories, the organs of administration, the schools and other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of them. At a certain extent, this had spee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Key words: military revolution; Europe; soldiers; deportment; idea about value

军事革命 (military revolution) 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问题。自英国学者迈克尔·罗伯茨提出这一概念以后,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从军事变革角度探讨转型时期欧洲历史的巨大学术价值, 纷纷加入到关于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来。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军事革命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 以往学者在分析军事革命的影响时, 或者强调军事革命提高了欧洲军队在陆地和海上的作战能力, 从而推动了欧洲全球霸权的建立, 或者强调军事革命扩大了欧洲军队的规模和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 从而促进了近代国家的形成。至于军事革命对欧洲军人行为

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 欧洲军事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其中一些重要变革不仅在短时间内剧烈地改变了欧洲战争的面貌, 而且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就是所谓军事革命。

从前一个角度研究的有杰弗里·帕克和克里福德·罗杰斯等, 参见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lifford Roger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s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In Clifford Rogers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持后一种观点的有迈克尔·达菲、科林·琼斯、布雷恩·道宁及布鲁斯·波特等人, 参见 Michael Duffy, *The Foundations of British Naval Power*. In Michael Duffy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State, 1500- 1800*. Exeter: Exeter University Publication, 1980; Colin Jone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the French Army under the Ancien Regime*. In Michael Duffy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State, 1500- 1800*; Brian Downing,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Bruce 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却被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本文试图就军事革命对欧洲军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做一些探讨,以期从一个侧面加深对近代早期欧洲军事领域的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理解。

一、军事革命是军人与平民分野扩大的重要原因

军人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群体,军队里形成了与社会其余部分有着明显区别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是近代早期欧洲普遍发生的现象。1976年,英国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在《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到了18世纪,欧洲战争都由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那种专业军队来进行了……只有这样的专业军队的出现,才能在社会上明确划清‘军人’与‘平民’的界线……军队成为互抱团、高人一等的一群人,自成一种明显的亚文化,与社会上的其他人迥然不同,不仅因为职能不同,而且在生活习惯、衣着打扮、人际交往、享受特权以及职务所要求他们承担的责任方面,都不相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霍华德说欧洲军人形成一种亚文化是在1700年左右,但军人与平民的这种分野是在此前几个世纪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

那么,导致近代早期欧洲军人与平民分野扩大的原因是什么?约翰·黑尔在1985年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战争与社会,1450-1620年》一书中提出了一种解释:“随着雇佣兵队长在供养和领导军队方面逐渐担当起与‘天然的’地方首领同样重要的作用,随着战役的延长进一步隔断了田野-乡村生活与战场-军营生活之间的联系,以及随着永久性军队的形成,军人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社会成分这个问题就变得日益切题了。”

应当承认,黑尔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封建时代垄断欧洲战争事务的骑士阶层,同时掌握着大量土地和政治权力,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那时,欧洲军人与平民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士兵作为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出现,的确是随着封建骑兵的衰落和专业化雇佣军的增加而开始的。然而,这样的解释似乎还不够完整。如果说军人形成独特的社会群体是由于雇佣军的兴起及其后来被常备军所取代,那么,雇佣军的兴起和衰落又是由什么导致的呢?这样的追问是必要的,因为军人的面貌以及军队组成形式的变化,最终都取决于作战方式的演变。

实际上,雇佣军在欧洲的兴起与14世纪的步兵革命有着很大关系。步兵革命是指以瑞士方阵和英国长弓手为代表的步兵取代封建骑兵成为欧洲战场主宰的过程。中世纪在欧洲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是手持长矛的封建骑士,其他人员只是封建骑兵的辅助力量。直到14世纪初,经过良好组织的步兵才开始取得击败重装骑兵的希望。

英国人大概是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与南威尔士的战争中遇到长弓的。在与苏格兰人的长期战争中,长弓的使用方法不断得到改进。通过长弓手和下马骑士的战术配合,英国步兵在与重装骑兵的对抗中接连取得胜利。不过,决定性地导致重装骑兵衰落的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步兵方阵。在反抗奥地利的斗争中,瑞士各邦凭借纪律和训练使它们的长枪兵具备了很强的凝聚力,在进攻和防守中都能保持整齐的队形。这种组成密集方阵的步兵不仅能够抵挡重装骑兵的冲击,而且在进攻方面也显示出极大的威力。由于采用新战术的步兵在战场上一再显示出优势,法国、西班牙、勃艮底、意大利及德意志各邦相继采用了瑞士或英国的战术。14世纪以后,欧洲军队中骑兵的比例越来越小、步兵的比例越来越大。在中世纪晚期极度频繁的战争的压力下,步兵革命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战争的面貌。步兵革命打破了封建贵族对欧洲军事事务的垄断,导致了封建征兵方式的衰落,同时也促进了雇佣军的兴起。

欧洲雇佣军发展的顶点是三十年战争时期。三十年战争以后,欧洲各国开始放弃雇佣军,转而谋求建立常备军。根据富勒的解释,常备军是“一个经过训练的长期服役的部队实体,它与平民相隔离,其在平时和战时的行为都受到严格的控制”。雇佣军被常备军取代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战术革命。正如迈克尔·罗伯茨所指出的那样,这场军事变革的核心内容是采用了“齐射”战术。“齐射”战术要求整列士兵的动作必须

迈克尔·霍华德著、褚律元译:《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J. R. Hale, *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1450-162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7.

Richard Arthur Preston, *Men in Arms: A History of Warfare and its Interrelationships with Western Society*. Fort Worth: Hd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91, P75-76.

Dennis E. Showalter, *Case, Skill, and Training: The Evolution of Cohesion in European Armi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57 (July 1993), P424.

John F. C. Fuller, *The Conduct of War, 1789-1961*. New Brunswick, N.J., 1961, P21. 转引自 Bela K. Kiraly, *Society and War from Mounted Knights to the Standing Armies of Absolute Kings: Hungary and the West*. In Janos M. Bak and Bela K. Kiraly (ed.), *From Hunyadi to Rakoczi War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ungary*. New York: Brooklyn College Press, 1982, P34.

整齐划一、准确无误,而各列之间又必须配合默契,这样才能保持火力的连续性。然而,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训练,并使士兵们遵守严格的纪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切。要想使士兵接受训练,并保持严格的纪律,就必须长期供养他们。16世纪末,从海外贸易中得来的巨大财富使荷兰得以常年维持一支军队、能够为军队提供稳定的供应,并可以向士兵按时支付较高的工资,这使莫里斯亲王可以让士兵在战争间隙进行日常训练。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则通过在全国实行义务征兵制,逐渐建立起一支长期服役的国家军队。莫里斯和古斯塔夫的改革预示着欧洲军队未来的发展方向——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常备军取代雇佣军。随着战术革命的传播,欧洲各国相继开始发展常备军。

常备军的建立使专业军人取代雇佣兵成为欧洲军人的主要成分。专业军人不需要像雇佣兵那样用领到的薪饷自己去购买武器装备和给养,他们的装备和给养都是由国家统一提供的;他们也不像雇佣兵那样住在旅店或者老百姓家里,而是集中居住在军营里。从16世纪早期起,为了规范和控制士兵的行为,欧洲各国不仅制订了越来越多的军队纪律,而且力图用国库的资源来提供武器装备和满足士兵衣食住行的需要。然而,直到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战术革命后,随着常备军的逐渐建立,这些努力才真正取得一些实效。17世纪前期,尼德兰主要城市建起了军营。法国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在军营里安排士兵的食宿。显而易见,常备军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欧洲军人与平民的分野。

总之,近代早期欧洲专业化雇佣军的发展及其最终被常备军取代,是欧洲军人与平民的分野逐步扩大的主要原因。然而,无论是中世纪晚期雇佣军的兴起,还是三十年战争以后它的衰落,都分别与一场军事革命密切相关。14世纪的步兵革命是雇佣军取代封建军队的重要原因,而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战术革命是雇佣军被常备军取代的直接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军事革命是导致近代早期欧洲军人与平民的分野扩大,并使军人成为一种独特群体的重要原因。

二、军事革命在军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转变中的作用

既然近代早期欧洲军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群体,那么他们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与平民相比具有哪些特点呢?下面的分析将表明,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集体感、合作精神、标准化、等级制是近代早期欧洲军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军事革命在这几项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中世纪欧洲的军队是由贵族骑士按照封建原则随意

组合起来的。这些骑士队伍存在的时间通常都很短。按照惯例,骑士一年当中只有义务为领主服役40天;超过这个期限,如果领主还希望他们留在战场上,则需要给予物质上的补偿。而且,中世纪战争的季节性非常强,冬季是自然的休战时期;即便是在绵延多年的战争中,交战各方的军队也都是在每年战季结束后解散回家,等到第二年战季开始前再重新召集起来。领主们既然不能长期把骑士聚集在一起,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他们进行集体训练。由于上述原因,中世纪的骑士军队中几乎不存在现代军队里那种服从纪律的精神和忠于集体的观念,有的只是追求荣誉的狂热和个人英雄主义,如果说有忠诚的话,那是对领主个人的忠诚。所以,封建时代欧洲军人最崇尚的美德是追求荣誉、个人的英勇和对领主的忠诚。

14世纪的步兵革命使封建骑士所崇尚的勇敢、荣誉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些精神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对于整齐地排列在密集方阵中的士兵来说,逃跑是很困难的,而且身处一个强大方阵本身就能带来某种勇气。另一方面,封建骑士那种毫无纪律可言、追求个人荣誉的作战方式,已不适合于方阵时代的战争。乔治·胡珀特(George Huppert)曾经正确地指出,14、15世纪以后,“战争不再可以凭借贵族的冒险精神而取得成功。单个军人的训练、勇气和自信,在面对由受过训练并随时准备像杀猪一样轻易地割断公爵喉咙的众多士兵组成的庞大队伍时,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如今,单个士兵的作用只有在组织良好的方阵中才能发挥出来。这就要求士兵服从一定的纪律,并且在战场上能按照统一步调做出一致的动作。由热爱自由的公民组成的瑞士军队(1291年,瑞士联邦脱离奥地利,实现民族独立,随后实行了普遍兵役制度)显然做到了这一点,因而能够屡屡战胜奥地利的封建骑兵。小戴维·佐克和罗宾·海厄姆称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看来并非夸张。

Colin Jone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the French Army under the Ancien Regime*. In Michael Duffy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State, 1500-1800*, P42.

赫恩肖认为,骑士基于军事方面的特性而具有的三个主要美德是勇敢、忠诚和慷慨。参见 Hearnshaw, F. J. C., *Chivalry and Its Place in History*. In Edgar Prestage (ed.), *Chivalry.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ivilizing Influ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6, P32.

George Huppert, *After the Black Death. A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Europe*.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1.

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简明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页。

尽管瑞士方阵的推广对欧洲军队提出了加强纪律和训练的要求,但直到 16 世纪末,这方面的进步非常有限。因为这一时期欧洲最主要的武装力量是雇佣军。由于雇佣军与顾主之间极不稳定的关系(时而受雇佣,时而被解雇,今天的顾主可能是明天的敌人),要想使他们接受任何程度的纪律或者训练都是相当困难的。除了西班牙在意大利各处的驻军外(在 15、16 世纪,西班牙招募的新兵总是先在意大利驻防,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再被送到弗兰德尔等其它地方),雇佣军时代欧洲所有军队都不对士兵进行系统的训练。即使是在采用瑞士方阵战术的德国雇佣军里,操纵武器和保持队形的训练也是各个雇佣兵队长根据个人喜好随意决定的。曾经在法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军队中服役过的托马斯·奥德雷(Thomas Audley)指出,退役士兵在训练民兵方面没有任何用处,因为这些士兵本身在服役期间就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近代以来,欧洲首先对士兵进行正规、系统训练的军队是莫里斯亲王统帅下的荷兰军队。

如前所述,莫里斯亲王是战术革命的首倡者,而战术革命要求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并强调纪律。为此,莫里斯亲王采取了一项对后来欧洲军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措施——让士兵进行系统的日常操练。通过阅读韦格提乌斯(Vegetius)、艾利安(Aelian)等古典作家的著作,莫里斯了解到古希腊、罗马时代调度军队的方法。他在吸收罗马做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操练方法:训练士兵在操场上踩着鼓点步伐整齐地行进,并训练整个单位的士兵按照口令统一地前进、后退、向左、向右,将纵队变成横队,再由横队变成纵队。莫里斯把这种操练变成了士兵们在不打仗时每天必须进行的常规任务。

为了提高部队的训练效果,莫里斯亲王的表兄弟及亲密合作者约翰伯爵(John of Nassau)约在 1599 年创造了一种新的操练方法——用带图的操练手册来指导部队的训练。他仔细分析了操纵各种步兵武器的过程,将其分解为一系列独立的动作,然后把每个动作绘成草图,并编上序号。其中长枪的动作包括 15 幅图,火绳枪 25 幅,毛瑟枪 32 幅。在 1606 年到 1607 年,约翰伯爵请一位专业雕刻家雅各布·德·格恩(Jacob de Gheyn)对他的草图进行修改——在新方案中,长枪的操纵过程改为 32 个动作,火绳枪和毛瑟枪均为 42 个动作——并绘制成兵器操练手册予以出版。操练手册发到部队以后,士兵和教官们看着它就能知道如何操练。这本手册一经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籍,不久便出现了丹麦语、德语、法语和英语的译本,大大加快了莫里斯式操练方法向欧洲各国的传播。1616 年,约翰伯爵在锡根(Siegen)创办了一所军事学院,向上流社会的青年们传授战略、战术等。这个学院的毕业生中有一位瑞典贵族雅各布·德·拉·加蒂(Jakob de la

Gardie)。他后来成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事顾问,并把在荷兰学到的操练方法带进瑞典军队。古斯塔夫接受了莫里斯的操练方法,并结合自己的实践加以完善,随后将这种卓有成效的操练方法传播给了欧洲其它军队——首先接受这项革新的是各新教国家,然后由新教各国传播到法国,最后又传给西班牙人。

莫里斯式操练准确地规定出士兵的每个动作,并要求做到准确无误、整齐划一。在日复一日的反复操练中,不知不觉地向士兵灌输了一种服从精神。所以,这种操练的推广有利于改善部队的纪律情况,从而提高其战斗力。在过去,当一支军队长期驻守一个要塞,或者对一个守卫得很好的要塞进行围困时,常常会因连续几个月的无所事事而使士兵们变得懒散而放荡。如今,每天进行几个小时的操练,使部队更容易保持较高的士气和良好的纪律。

莫里斯式操练的另外一个作用是可以培养士兵的集体感及相互合作的精神。正如几百年后泰勒对产业工人劳动过程的合理化改进一样,莫里斯式操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士兵操纵武器的过程分割成一系列具体而又有规律可循的独立动作。在操练中,士兵们按照约翰伯爵制作的武器操纵流程图反复实践,目的不仅是要达到对武器的熟练操纵,减少忽略任何重要步骤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要使整个单位中每个人的行动协调一致。这简直就是军事领域里的泰勒主义。这样的操练,无形中就

J. R. Hale, *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1450- 1620*, P164.

实际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欧洲军队也很重视士兵的纪律和操练,只是在封建骑士和雇佣军相继占主导的 1000 多年中,纪律和操练才失去了在欧洲军队里的位置,到 17 世纪以后,欧洲军队又恢复了对纪律和操练的重视。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 1800*, P20- 22. 到 1649 年,甚至还出现了新操练法的俄文译本,参见麦尼尔著,倪大昕、杨润殷译:《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0 页。

Michael Roberts, *Gustav Adolf and the Art of War*. In Michael Roberts (ed.), *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7, P63; 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 60 页;麦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第 140 页。

范·杜恩(Jacques van doorn)在《士兵与社会变革》(*The Soldier and Social Change*. Beverly Hills Sage, 1975)一书中对莫里斯和泰勒两人作过很有意思的对比研究。请参阅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 - 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38 页。

在士兵当中培养了一种集体感和相互合作的精神。其中道理正如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所言,“当一队人的手臂和腿部肌肉长时间地一致活动时,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原始有力的社会联系……尽管操练看起来似乎单调而重复,却往往把来自社会最低层的各种人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甚至在生命显然处于危险的紧张时刻也能服从命令。”毫无疑问,这种集体感和合作精神同样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莫里斯和古斯塔夫所引导的军事革命是一场全面的变革,其内容不仅涉及战术和操练,而且包括军队的组织和后勤等方面。因为莫里斯和古斯塔夫所统帅的军队都是由国家供应武器装备及其它一切物资的常备军,这就为武器装备和士兵着装的标准化创造了条件。1599年,莫里斯发现,要使新的战术方法运转正常,必须给军队装备统一的武器,因为标准化的操练是以标准化的武器为先决条件的,更何况有许多战争实例表明,采用统一的规格对于提高火器的效率是至关重要的。爱尔兰军人兼政治家罗杰·波义耳(Roger Boyle)曾经抱怨说,在17世纪40年代,他的毛瑟枪手几乎因为供应来的子弹与手中的武器规格不统一而输掉一场战役——由于子弹比枪口的尺寸大,士兵们不得不将多余的部分咬掉或者削去,这样不仅浪费了许多时间,而且影响了子弹的射程。战术革命和常备军的建立不仅导致武器装备的标准化,而且使士兵的着装也开始呈现出标准化的趋势。欧洲军队采用标准化制服大约开始于17世纪20年代。1626-1627年,瑞典计划建立一个中央仓库,以便为士兵提供军服。英国内战时期,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已经采用统一着装。17世纪,标准化军服已经在欧洲各部队中逐渐建立起来。到这个世纪末,甚至有不少君主也养成穿军服的习惯。武器装备和军服的标准化带来的一个好处是降低了军需品的生产费用,因为大批量地生产同一种产品显然比生产规格不同的产品效率更高。除武器装备和士兵着装的标准化外,17世纪欧洲军队呈现出的标准化潮流还包括更丰富的内容。由于成年累月地接受整齐划一的训练,甚至连士兵们的行为和习惯也出现了一致化的倾向。其结果正像麦克尼尔所说的:“既然每一个士兵可以按标准化操练的精确动作进行训练,增援任何减员的单位几乎变得和替补已经消耗的滑膛枪弹丸一样简单。总之,士兵就和他们的武器一样,成了一架巨大的军事机器内可以替补的零件。”

战术革命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确立了军队内部的等级制。在中世纪的骑士军队中,并没有固定的组织系统和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一般来说,领主本人就是他所召集的这支队伍的统帅,并没有专门的军官帮助他控制和指挥那些骑士。在作战时,骑士们凭着个人的勇武互相

厮杀。近代早期欧洲的雇佣军同样没有固定的组织系统和明确的等级制度。迈克尔·霍华德说:“他们带着自己的工具来干他们的活,相互间视作与自己平等的人,分工不同,但等级上是平等的。”然而,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出于战术和后勤的需要,欧洲军队内部逐渐发展出一套与旧的社会分层平行的等级制度——系统化的军衔制度。在雇佣军时代,基本的军衔是上尉,后来又出现了上校。三十年战争期间,出现了少校军衔,接着出现了将军军衔。为了控制出卖军官职位的情况,卢瓦侯爵于1660年规范了法国军队内的等级制。接着,俄国和瑞典相继公布了军衔表,从而在全国范围实现了对军官等级制的规范。

总之,14世纪的步兵革命和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战术革命(尤其是后者)对欧洲军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场军事革命使近代早期欧洲军人的行为和观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中世纪骑士军队那种以追求荣誉、个人的英勇和对领主的忠诚为美德的观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集体感、合作精神、标准化、等级制为特征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三、军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传播与影响

尽管近代早期欧洲军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但没有一支军队与社会其余部分是完全隔绝的。只要看看弗兰克·塔里特的描述,近代早期欧洲军人与平民之间接触的频繁程度就非常清楚了:

现役军人当然免不了与平民的接触。不仅士兵们经常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而且有大量的平民总是尾随着军队,作为仆人、马夫、木匠、驾驶员、典当商、小贩、屠夫、洗衣女工、妻子和妓女为军队提供服务。另外,虽然当兵通常意味着其平民职业的终止,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尤其在穷乡僻壤驻守的部队,经常从事第二职业。这一方面是为了克服这种生活的无聊乏味,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其薪水的不足。在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中,保留平民职业的情况是如此广泛——这种情况受到官方的积极鼓励,这样政府就可以进一步减少部队已经很微薄的工资——以至于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声称,当他的军队开始行军,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其工作时,国产税的收益下降了三分之一。甚至在作战

麦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第137、143-144页。

Geoffrey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2.

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59页。

时,士兵们也不会与平民隔绝。在攻城战中,农民被征调来挖掘战壕或者修筑将由士兵们守卫的壁垒;城镇居民(包括妇女)被强制与守卫部队并肩地保卫自己的城镇,或者至少要与他们一道忍受疾病和饥饿带来的痛苦。只有在野战中,军人与平民之间才会有一定距离,即便在这时,妇女们也要到战场上充当护士,而且,那些追求身历其境的暴力带来的兴奋的平民观众,也会呆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观看战斗行动。

从塔里特的描述看来,士兵们无论在军营里,在驻守的要塞里,在行军途中,还是在临时宿营地,都离不开平民的支持。平民们要通过出售食物和衣服给士兵,或者向他们提供贷款,甚至为他们提供色情服务来获利,有时会遭到士兵们的蛮横无理或者不守信用。因此,在许多军营里树起了绞刑架,以提醒士兵们不要随意虐待百姓。另一方面,因为士兵们经常遭受老百姓的剥削,很多国家的政府就颁布了规定食物、饮料和寄宿价格的法令(其中连一张羽毛软床多少钱、一个床垫多少钱、一个稻草枕头多少钱都有详细规定),以保护它们的士兵。军人与平民之间的广泛接触限制了他们与平民社会隔离的程度,同时也扩大了军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对平民社会的影响。

不仅现役士兵与平民的接触很频繁,而且多数士兵并非终身呆在军队里,退役军人总是要回到平民社会的。尽管从 16 世纪初起欧洲有些国家就开始建立残废军人收容所,但有幸进入收容所的只占残废军人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往往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约翰·黑尔在形容近代早期欧洲退役军人的悲惨遭遇时,引述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妓院老板博尔特被人责备不该从事这一职业时,他回答道:“你让我干什么?上战场吗?一个人在那儿干上 7 年,如果丢掉一条腿,到头来连为自己买木头腿的钱都不够。”当然,与那些残废的退伍兵比起来,健康的退役军人境遇则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谋生。不过,多年的戎马生涯往往使退伍兵们很难再适应平民社会的工作,而近代早期缺乏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也难以吸收随战事结束而突然出现的大批退役军人。退伍兵们要找一份工作是很困难的。因此,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立法手段来帮助退役军人重新就业,比如要求行会不得妨碍退役军人重新开始他们入伍前所从事的职业,或者强制退伍兵们从前的雇主重新雇佣他们。虽然会经历许多挫折,但大部分退役军人最终还是可以就业的。随着近代早期欧洲武装力量规模的急剧扩大,或者用斯坦尼斯拉夫·安德泽耶夫斯基(Stanislaw Andrzejewski)的术语来说,随着军事参与率的逐渐提高,近代早期欧洲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当中包含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毫无

疑问,这些人在把军队里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平民社会传播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此外,日益增多的军人回忆录和反映军队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是军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平民社会渗透的重要渠道。总之,无论经过何种途径,大部分社会成员对军营里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总能够有一定了解和接触。

今天看来,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集体感、合作精神、标准化、等级制这些东西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是,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这些却是首先出现在军营里的新生事物。后来,这种主要由军事革命所导致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被有意识地引入到工厂、机关和学校等社会组织,以改善其内部管理。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说,到 17 世纪末,为了改善管理而进行的行政改革侵入了众多的活动领域,而“许多致力于扩充自己控制的行政资源的人们,毫无疑问都会直接关注军队模式”。

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可以听到诸如“实行军事化管理”、“一切行动军事化”之类的说法,有时也会看到某些企业把军事训练作为培养合格员工的重要手段。可见,通过引入军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改善一个组织的内部管理,至今仍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集体感、合作精神、标准化、等级制……这些东西,不仅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可以用来提高其它社会组织的效率。所以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近代早期欧洲军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发展,而军事革命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作者简介:许二斌(1974-),男,山西文水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汪谦干

Frank Tallett, *War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495- 1715. London: Routledge, 1992, P141- 142, 139- 141.

J. R. Hale, *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1450- 1620, P128.

R. B. 沃纳姆主编、施青林等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3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2 页。

军事参与率(Military Participation Ratio),指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员占社会总人口的比率,参见 Stanislaw Andrzejewski,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98, P33.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 - 国家与暴力》,第 139 页。